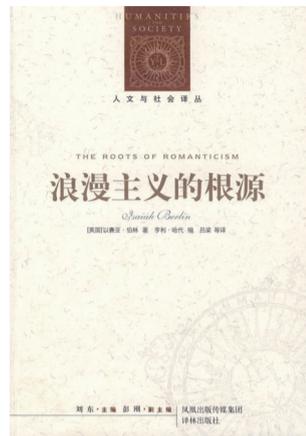


删
言
快
语



吕梁、洪丽娟、孙易译
《浪漫主义的根源》
[英]以赛亚·柏林著

观念之舞

□ 删乐昊

《浪漫主义的根源》一向被视为以赛亚·柏林的代表作,但是如果以赛亚·柏林尚在人世,我们将无缘得见这部代表作。

这本书源自柏林于1965年三、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所作的一系列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,在那之后,柏林试图将其整理为文字著述。十几年后,当柏林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后,他不断积累自己的阅读和笔记,希望把这本专著完成,他甚至把所有的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,列出一些标题,把笔记筛选出来并口述录音到磁带上……他作了大量工作,但最终全部搁浅,直到他去世,他仍对这本寄予厚望的著作未着一字。

反倒是他的演讲录音被不断重播,这些演讲首先在1965年的6月和7月在华盛顿特区的教育广播电台首播,到了1966年,又被BBC第三套节目重播,1967年再一次重播。到了1975年,澳大利亚未经授权播出了这些演讲。到了1989年,也就是柏林八十岁那年,英国BBC再一次重播了这些演讲。前后长达二十余年,柏林在演讲中所表达的观念仍未过时。而他那种清新、直接、强烈的演讲风格,也令一代又一代的聆听者感到心潮澎湃。

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·贝娄在1964年出版过一部小说《赫索格》,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摩西·赫索格的犹太学者,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,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教授成人教育课程,却未能成功,这门课程的名称就是“浪漫主义的根源”。小说一出版,便被认为是在影射同样身为犹太学者的柏林,连那个名字“摩西”,似乎也深藏隐喻。但索尔·贝娄和以赛亚·柏林双双否认了这种对号入座的猜想,索尔·贝娄甚至强调,他压根没有见过以赛亚·柏林。

柏林生前坚决反对出版这部讲稿,因为他觉得,不经过任何修改、夯实和扩充,就出版一些即兴讲演词,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荣行为,也不是正经学者该有的治学态度。他很清楚,口头表达有时候难免笼统含混,一旦落成白纸黑字,便可能经不起推敲。他在写给BBC电台第三套节目负责人的一份感谢信中这样自黑:“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:六个多小时狂热的、不时短路的、焦灼的、气喘吁吁的——在我听来,有时是歇斯底里的——演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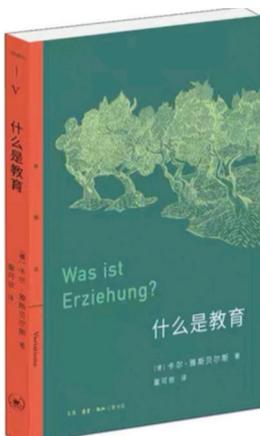
但以赛亚·柏林留了一个活口,他明确表示,同意人们可以在他死后出版其讲稿。似乎死亡是对于学术态度的一个巨大豁免权,生前那些即兴的、未必严谨的言说,此刻可以进入流通,接受“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”。

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《浪漫主义的根源》,一本观念史的杰作,而观念造成的后果,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意料。这也是以赛亚·柏林所有著作持续不断的母题。观念如何产生,如何传播,以及如何被理解,在观念的路径上分叉不断,人的利益、动机、认知的巨大差异,彼此交织,最终必将扭曲观念之笔。正如康德所说:人性这根曲木,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。柏林阐释并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观点:观念与其实践之间的差距,恰恰是人类不完美的尺度。

柏林认为,浪漫主义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,它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,也是西方意识领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。发生在十九、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,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。浪漫主义并非只有历史学的意义,我们今天的许多现象:民族主义,存在主义……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。浪漫主义脱胎于启蒙运动,虽然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是理性,而浪漫总带有非理性的特征。启蒙运动思想家哈曼引述休谟的名言: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,那答案会是,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,而是信仰。

理性主义接受了它的悖论,正是在追求智性的启蒙运动中,悖论之芽开始发萌。在柏林眼中,浪漫主义不单单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击或补充,它本身亦是“迄今为止西方意识最重大的变革”。

“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而混乱的领域,许多人身陷其中,迷失了,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,但至少可以说,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,一旦有人进入,便不可重见天日。因此,我只能如履薄冰地涉足这个领域。”在这种瞻前顾后的姿态中,观念史学家柏林开始了他的讲述,仿佛在跳一支探戈。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董可依译
《什么是教育》
[德]卡尔·雅斯贝尔斯著

教育即唤醒

□ 陆远

关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,中文世界有一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公案,名句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”,迄今还常被作为《什么是教育》中的格言广为传播。不止一位学者已经考证,这句话完全出自中国作者的手笔(一种说法是化用自作家张洁1979年发表的小说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),归于雅斯贝尔斯名下实在是以讹传讹的附会。尽管如此,“虽不中,亦不远矣”,这句话倒也给了雅斯贝尔斯的教育观做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注脚——在《什么是教育》的开篇,作者已经借苏格拉底之口,表达了类似的观念:“教育不是有知者引领无知者,而是人们互相帮助、互相促进,携手走向自我,从而使真理向他们敞开。”

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,雅斯贝尔斯称得上是一位奇人。作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,他没有受过任何学院式的专业训练,也没有追随任何导师的经历,其学术生涯主要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建立起与中西方哲学传统的链接,他创立的生存哲学,完全是个人不断求索,获得精神成长的产物。

中国读者对这位西方大哲并不陌生,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代表作《时代的精神状况》译入中国时,就成为风靡一时的读物,迄今长销不衰,他提出的“轴心时代”概念,更是影响深远。不过,雅斯贝尔斯著作中最早被引进中国大陆的,恐怕还是这本《什么是教育》。

《什么是教育》初版于1977年,那时雅斯贝尔斯已经去世多年,后辈学人从他的著作中辑录其谈论教育的内容编纂成书,是一本约略类似《论语》的语录。雅斯贝尔斯生活在一个见证了深远政治变革的时代,终其一生伴随纳粹政治与欧洲文明战后重建的历史进程。这本书中的不少篇章,正是写于德国面临内外深重灾难的严峻时刻,雅氏以哲学家的身份对有关教育的核心问题做了一番深入考察,其论述包括理性与精神、科学与人文、生存与历史、自由与权威等诸多议题,包含深刻的时代精神诊断。

精神成长与灵魂唤醒是雅斯贝尔斯追求本真教育的核心理念。“灵魂”大概是雅氏论述教育本质时出现最多的字眼,比如,“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,一个人若只是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的知识,即使他学识出众,他的灵魂也是不健全的”;比如,“在学习中,唯有被灵魂接纳的事物才能成为自身的财富,其他的一切都仍停留在心灵之外,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”,再比如,“真理在自我实现时发挥着唤醒灵魂的作用”。在雅斯贝尔斯那里,“灵魂”差不多等同于“自我”,之所以如此强调“唤醒灵魂”,是因为教育唯一的目标是最终实现自我教育。雅斯贝尔斯相信,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拥有对真理的认知,只不过尚未被我们意识到。教育的第一步,是让人“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”,也就是意识到自己内心尚有未被开垦的精神沃土,一旦如此,就不再是真正的无知。接下来的第二步,就是师生之间彼此扶持,切磋琢磨,发掘内心本真的理念,唤醒各自潜在的能力,而不是徒然从外部施加压力。雅斯贝尔斯并不反对知识和技术的传授,但他坚持认为“教育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,其次才是科学获知的过程”,因为“真知必须从每个人自身中获得,它无法像一件货物那样被转运,它只能被唤醒,就像重新回忆起仿佛很久以前便曾知道的东西”。雅氏推许苏格拉底那样“助产式”的教育方法,而对20世纪西方人津津乐道的科技教育成就不屑一顾,认为“如此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只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,训练有素的工人。他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”。

雅斯贝尔斯对教育状况的反思,与他“时代精神状况”的诊疗一脉相承。他用最通俗的话说,就是大部分人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”。在财富积聚科技发达的时代,人们反而失去了自我判断的信心和能力,把衡量自我价值的权利拱手让与外部世界,疯狂地追名逐利以提高身价,向外追求对自我的认同,也就失去了自我尊重的基础。正是基于这样的体认,雅斯贝尔斯更加看重教育的意义,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“帮助一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”。

作为20世纪一流的思想家,雅斯贝尔斯的文字明白晓畅,从不拒绝任何认知水平的读者。倘若用心聆听,这些金石之言在普遍“内卷”的当下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反观自身处境的镜鉴。他以教育为例,为我们在早已习以为常的精神迷障上划开了一条口子。只要努力睁开双眼,我们就在思想光亮中看到一个比现世中人要好的人影。这个人影可能是雅斯贝尔斯,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而努力睁开眼,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权利,更是生而为人应该享有的尊严和应当承担的责任。

远
见
近
拾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莫言著
《锦衣》

“锦衣”锦绣

□ 张无极

莫言的《锦衣》恰似一颗璀璨的文学明珠,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。这部作品以清朝末年的山东高密为背景,巧妙地融合了历史、人性、文化与命运等多重主题,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了解莫言创作《锦衣》的背景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。莫言生于山东高密,这片土地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。他从小接触到大量的民间故事、传说以及乡土风情,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养分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,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,对社会现实、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思考。

《锦衣》的创作,或许源于莫言对故乡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对民间文化的深厚情感。清朝末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社会变革剧烈,各种矛盾冲突不断。莫言通过对这个时期的描写,展现了那个特殊历史阶段人们的生活状态、苦难与挣扎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同时,他将民间传说、习俗和艺术形式融入作品中,如“人鸡幻化”传说、戏曲、剪纸等,不仅增添了作品的奇幻色彩,更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。

从文本主题特色来看,《锦衣》犹如一幅宏大而细腻的历史画卷。它深刻地反映了清朝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社会变革风起云涌,封建制度摇摇欲坠,新思潮不断涌现。在这个背景下,莫言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刻画,深入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多面。主人公秦兴邦的坚韧不拔与对正义的执着追求,季王氏的豪爽泼辣,以及众多人物在权力、利益、欲望面前的种种表现,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贪婪与自私,也看到了人性的勇敢与善良。同时,作品对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也进行了深入探讨。命运的无常在作品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,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时代裹挟,历经磨难,却依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,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and 感悟。

莫言在《锦衣》中的语言运用堪称一绝。大量方言、俗语和民间传说的运用,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。生动形象的方言词汇和精彩的对话描写,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,仿佛能让读者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。比喻、拟人、夸张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,使描写更加生动有趣,如临其境。在叙事节奏上,莫言把握得恰到好处。情节跌宕起伏,充满悬念和惊喜,时而舒缓,时而紧张,节奏的变化让读者始终保持着紧张和兴奋的状态。插叙、倒叙等叙事手法的运用,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,可读性极强。

《锦衣》能够满足大众阅读心理的需求,充满传奇色彩和冒险情节的故事,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,让他们沉浸其中。清朝末年的历史背景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和神秘感,莫言通过精彩的描写,将这个时代的时代感演绎得更加精彩绝伦。人物形象鲜明,性格各异,读者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,产生共鸣。幽默和诙谐的元素融入,缓解了紧张的氛围,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轻松和愉快。

此外,《锦衣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,比如在历史研究方面,它为我们了解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描写,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。在文学研究方面,莫言的语言特色、叙事手法和主题表达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范例。语言的运用、叙事技巧以及对人性、命运、文化等主题的探讨,为文学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。

莫言的创作风格独特而鲜明。他常常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,构建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学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,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,又有奇幻的想象和夸张的表现。莫言善于运用丰富的感官描写,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故事中的场景和人物的情感。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,无论是善良、勇敢,还是贪婪、自私,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同时,莫言对历史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反思,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描写,揭示出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人性的弱点。

在《锦衣》中,莫言的创作风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清朝末年的山东高密,在莫言的笔下变得生动而鲜活。他通过对民间传说和文化的融入,使作品充满了奇幻色彩。同时,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和对历史的反思,也让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总之,莫言的《锦衣》是一部引人入胜且富有创意的文学佳作。它以其独特的魅力,引领读者走进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,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和魅力。它是莫言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,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。